



是没有表情眼泪流下来，那个脆弱是很自然的，与生俱来的，学表演都学不来的，我们很喜欢看她那样。（当时）她突然来一个笑，我就蒙了，就说不行。她解释给我听为什么这样，我说我明白，我完全理解，但就是觉得你在演。

我们拍了8条，她最后说‘我真的哭不下去了，我想了一遍，我们家里每个人都死了，我的一条狗都死了，我突然活不下去了’。后来所有人都觉得第一条好，但我还是想拿掉那个笑，可是一镜直入，拿不掉，最后我就认了。认了之后大家都喜欢，我很多年都不了解、不明白。

但后来有两个经历使得我明白那个笑。一次是我拍《金鸡2》的时候，张学友正在配音间里面配音，突然间我收到一个电话，说柯受良去世了。柯受良是我跟张学友的好朋友，尤其跟他的关系特别特别好。我就进去拉他出来，把他推在墙边，两手抓住他的肩膀，我说小黑走了。他突然间用了他在《金鸡》里面角色的那个“嘿”笑一下，笑完才哭。我完全不明白，为什么他突然间笑一下，那个笑就是跟张曼玉一样。

第二次是20年后，今年，我爸去世。我半夜3点接到电话，他是很健康突然间走的。我接完电话之后，第一个反应，没有笑出来，但是我心里觉得很荒谬，我不是哭的，我第一下反应是怎么可能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笑话。

改变，就是为了不改变

（《甜蜜蜜》公映后，1996年

圣诞节当夜，陈可辛收拾行装远赴好莱坞，后来在美国拍摄了电影《情书》。我去好莱坞那两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，因为它让我学习了很多。不是技术，是产业方面，怎么去面对老板——因为我们以前在香港拍戏，都是独立电影，虽然是商业片，但是导演说了算。到好莱坞，所有东西都有制度，说白了就是上市公司，年轻人面对投资者，就是面对一大堆的提议、建议、审核，各种不同的要求。

我觉得那个制度非常不合适我的创作，它太没有灵活性。我们拍戏，香港人是很有灵活性的，突然间想到什么就可以加。在好莱坞的那两年挺郁闷的，回来之后做了泛亚洲的合作，建立了很多泛亚洲的关系。当然，后来在内地拍了我人生里面很幸福的十几年，拍了很多我想拍的电影，观众也接受，也不赔钱。

我是最讨厌也不喜欢看任何体育的，我自己在中学都没有玩过任何的运动，所以个子才那么矮。拍到网球（《李娜》）、排球（《夺冠》）的时候，我一直回头看我的副导演和监制，这个行不行，这个像不像？我也很讨厌动作片，我看电影的时候，永远一看到打，我就快进，一看到下

可能很多年轻导演你们以为很难，你到我这个位置比你更难。

下图：《甜蜜蜜》剧照。



面有字幕讲话了，就停下来。我只想听故事，只想看感情和人物，所以我对于场面、技术这些都没有兴趣。

我要拍《武侠》《投名状》《如果·爱》，包括《夺冠》《李娜》，这些对于我来讲都是极致痛苦的事情，但是有足够的故事和人物去支撑我拍这些电影。技术那部分我可以找一些专家来帮我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些资源，可以找到好的专家帮我去完成一些我自己没有感觉的东西。

改变就是为了不改变，不改变的话，就没有办法生存了。大家别看这么多光环，其实做到我这个阶段很难的，可能很多年轻导演你们以为很难，你到我这个位置比你更难。这真的不是说风凉话，确实是，这条路就是很难的一条路。

很多人会觉得这样你就不是一个作者导演，什么都拍，就是一个类型片、商业片的导演，对于我来讲，我是一个要生存的导演，就是大家常说要成功、要卖钱。其实没有多卖钱，电影永远都不是一个特别赚钱的行业。只是能够回本、能生存就很难了。

我唯一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就是，我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、做过任何一部电影是我不相信的。我最新的电影，希望很快能上，就是讲打网球的《李娜》。整个剧本里面最感动我的一句话，就是她说，她每天深深地相信自己，也深深地怀疑自己。

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，因为我觉得人生的悲观是谁都知道，不用说的，人生里面会碰到所有的问题，但乐观是当下，当你乐观，当下就快乐了。■